



【歷史與現場】

1

張學良 與西安事變

史學家唐德剛推崇這本書「是這位不平凡的歷史人物張學良將軍的第一本全傳……持論公允，文筆流暢，頗得我心」，為傳世傑作。本書旁徵博引，對事變始末內幕祕辛，以及周恩來在事變中的角色，和後來張學良超過半個世紀的軟禁，都有完整的交待……

傅虹霖 / 著
唐德剛 / 序



目次

前言	傅虹霖	3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代序之二)		
西安事變新視野(代序之二)	吳天威	15
唐德剛		6
自序		17
【導言】		20
【第一章】二十六歲的少帥		38
【第二章】東北向何處去		54
【第三章】與蔣介石聯盟		72
【第四章】「九一八」事變與「不抵抗將軍」		94
【第五章】初會周恩來		124
【第六章】西安事變背景		143
【第七章】兵諫序幕		163
【第八章】西安事變——兵諫及國內外反應		203
【第九章】釋放蔣介石		236
【第十章】西安事變的結局		271
【第十一章】幽居歲月		302
【結論】		336
張學良年譜簡編		340
作者採訪一覽表		359
附錄		360
主要參考書目		

前言

傅虹霖

本書宗旨在於描述張學良將軍的戎馬生涯，分析他對中國現代史的傑出貢獻。

張學良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聲威顯赫、精明幹練、富有傳奇色彩而又頗具爭議的頭面人物之一。他為挽救瀕臨淪亡的中華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值得欣慰的是，他所做出的犧牲不是徒勞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像一顆流星，雖然轉瞬即逝，但它在劃破夜空時發出的奪目之光，人們將永誌不忘。

張學良以二十八歲少齡，繼承父業，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軍閥，聞名海內外的少帥。然而時隔不過八年，這位一度叱咤風雲的少帥便成為已故蔣介石委員長的階下囚，至今仍在台灣過着幽禁的生活。蔣介石之所以這樣做，是對少帥曾試圖以兵諫逼迫他發動一場舉國一致的抗日戰爭所採取的報復。

兵諫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七年），蔣介石正式決定，以戰爭的形式抵抗日本的侵略。正是這場戰爭，使得中國各個政治、軍事派別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終於打敗了日本人，致使中國擺脫了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戰爭以來一直遭受日本凌辱的命運。此外，這場戰爭，加速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進程，最終把中國推進到世界民族之強林。

儘管張學良是位風雲人物，在中國現代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關於他的論著還少得可憐。因此，研究這位唯一仍然健在的軍閥，對於研究中國現代史就顯得極為重要了。筆者根據新發現的檔案材料，

再度調查了西安事變，將會有助於搞清歷史事件的真偽，重新再現張學良在整個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

筆者在本書中採用忠實於史的手法，對少帥從少年時代到成年時期，從一個花花公子成為軍閥的一生進行了探討和分析，並且對他的政績和戎馬生涯給以客觀的評估。諸如，他與蔣介石的交往，他反對日本侵略的策略，他與共產黨人合作的背景及扣押蔣介石的歷史性事件等方面，都作了實事求是的探討，一九三七年，蔣介石最終決定抗日，中國實現了一致對外的局面，張學良在這其中的作用如何，本書也作了客觀的評價。

如何準確把握和理解張學良的政治觀點及未明確說明的政治主張這一不太容易回答的問題，本書主要是通過分析張學良的私人記述等，來給予回答。

為了寫好此書，筆者查閱了所有在美國可以找到的原始資料及第二手資料，並親自前往台灣、香港、北京、瀋陽和西安等地，發掘、收集有關張學良的原始資料，拜訪了許多歷史見證人。作者曾數次飛抵台灣，試圖與張學良直接會面。很遺憾，在與國防部長、警備司令部以及其他一些國民黨要員多次會晤交涉之後，親自採訪張學良的請求遭到了拒絕。不過，作者有幸得到了採訪張學良以前的部下以及曾參與這段重大歷史事件的一些國民黨領導人的機會。

爲了把張學良刻劃得更全面、更真實、更準確，筆者除了遍訪天下活着的歷史見證人以外，還查閱了以下文獻資料：

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政府文件；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記錄匯編；

台灣青潭國家檔案館的官方文件；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檔案館的官方文件；

日本外務省的官方文件：

英國外交部機密檔案中國部分（1928-1937）：

德國外交部檔案，1918-1945年德國對外政策文件：

張學良本人的「懺悔錄」：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宋美齡的《西安軍事政變》：

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

本書共分十一章，前五章探討了張學良的生平和處世，他與日本人、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接下來五個章節涉及張學良扣押蔣介石（西安事變）的經過及後果。最後一章敘述了張學良被幽禁的情形。結論部分分析了張學良對中國現代史所做出的貢獻，同時也是筆者的結論。

有關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史料多如牛毛，且又褒貶不一，寫作中頗費思量。秉筆直書，避免各種偏頗，乃筆者始終信守的宗旨。筆者生於四川省，與張學良並沒有什麼同鄉之情。每當遇到帶有偏見的資料，筆者總是把它們與政府文件或中性的原始資料相對照，用相互參照的方法來辨認那些看上去似有偏頗之嫌的資料。對於個人寫的有關張學良、蔣介石和蔣夫人及其他人的引文，也總是從政府文件或從第二個、第三個學者的分析中求得證實。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代序之一）

唐德剛

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年當國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紀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占鰲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的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鐮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它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過一部叫做「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這部電影裡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裡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裡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

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裡。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是一個比小說書上「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滿清時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長方面。他所長的「方面」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乃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

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兵敗之後，爲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是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歷代帝王和歷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禱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慌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爲是不祥之兆。

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分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爲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爲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只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別明亮的。可是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

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作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只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

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却是從一個公子哥開始的。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著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材。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是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

這三種不同的行業，併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達官顯貴子弟，生活放蕩的，也是成陣成群的。但是漢卿吃喝玩樂的紀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岳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却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裡情魔情怪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份，而漢卿你却一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癡情，羨漢卿之艷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情性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公子哥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慢說是像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悽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趙一荻，我們歷史家也替你喝彩！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

學良才二十出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我們細閱本書便知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台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

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衆也就統率無人了。

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據一方，足爲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證的歷史家，尤其是本書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讀者可細玩之。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和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幡然「易幟」。

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掣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患史中，安祿山、石敬瑭、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嗎？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立難以爲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帥當年李鴻章以夷制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不顧，却（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爐火純青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

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爲，與當時那些私人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却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欲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爲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作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爲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辭，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面，知恥近乎勇，却是很難能可貴的。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歷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干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第一，事變之發動是激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北伐之後，他爲謀求國家統一，不惜自棄歷史，毅然「易幟」，歸順中樞。如今外患急於燃眉，蔣公必欲置中共全軍於死地，不滅不休，毋乃太過。學良口勸不動乃貿然實行兵諫，希望蔣公不爲己甚。張氏這種心理基礎，蓋亦爲史家所不容否認者。

第二，西安事變之發生，建議爲楊，主動爲張。迨至騎虎難下之時，學良「問計無人」，致使精明而識大體的周恩來變成「謀主」。這點也是不爭之論。

不過話說回來，「西安事變」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公本人也未嘗不無實惠。蓋西安事變，則蔣氏之剿共戰爭，以蔣氏之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剿共戰爭，將伊於胡「底」？實無人可以臆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湯止沸，莫如去薪。共產黨有群眾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而專靠槍桿來剿共，就是揚湯止沸，何況外患緊迫，大敵當前。有誰能保證，一把野火就可把共產黨燒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再者，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於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只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公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爲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統一，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台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

妄測了。

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復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了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是誰之過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

但是不論我們對「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是怎麼個看法，這樁嚴重的「事變」和它的多彩多姿的策動者，在我們向以史學炫世的中國，不能沒有一部公正翔實的傳記。今日坊間有關張、楊之作和老帥少帥片斷的傳記，也並不少見，可是由一個職業史學工作者，窮根究底的來鑽他個牛角尖，寫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論文，則尚不多見。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十年之功，寫出了這部《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似乎還是這位不平凡的歷史人物張學良將軍的第一本全傳，雖然她所寫的還只是限於張氏「政治生涯」這一面，至於其他多彩多姿的衆多方面還有待來者。

本書作者傅虹霖博士，於漢譯本完篇之後，不棄淺薄，曾一再要我為他這本中文版寫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為我對少帥張學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為我所知道張學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書——我是這本傳記英文原稿的第一個忠實讀者。在作者撰寫過程中，從導言到結論不但逐字逐句的細讀，有時還簽注意見，參酌大綱，詳訂細節。何以如此呢？因為本書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國紐約的紐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博士論文。在她撰寫期間，不才適受聘為該校史學系博士班的客座導師。她適是我這位不學導師的博士研究生。這就使我對她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的細細閱讀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美國名牌大學中有關「博士論文」的撰寫是十分嚴肅的。簡言之，那就是胡適所說的「拿綉花針

的功夫」。一幅百尺錦綉，是用小小的綉花針，一絲不苟、一針針地綉出的。不但要「大膽假設」，更要「小心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夸夸其談、望文生義等新聞報導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許的。

還有在「方法學」上的選擇也是極其嚴格的。我國寫舊式傳記的程式，也被「社會科學處理」的方法所替代。立言持論都要以社會科學各部門的法則為依歸，不可信口開河。這樣一來，不但難為了學生，也難為了導師。前者的訓練便是後者的責任。這種訓練，在中國舊戲劇界裡叫做「坐科」。經過這種嚴格地坐科訓練的演員，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則便是「票友」。但這不是說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畢竟是一種對「基本功」的訓練，他的底子究非「玩票者」所可比。本書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學界有才華而又有科班訓練的專材。筆者不學，竟曾一度做過這樣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論文導師。但我對這樣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內疚，因為我雖忝居教席，我對有關張學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識，大體依賴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說她是青出於藍，那簡直是我自抬身價了。

我說這種話並非謙虛，而是事實。她這位傑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導過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任教十餘年。老實說，那時在我輔導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說獲益匪淺。理由是那時我兼長哥大中文圖書館，並且教授一門「中國目錄學」。坐擁書城，二十四小時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艱澀題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諸生問學，往往半日之談，便可省却他們數周數月甚至數年之功。這不是誇大，實在漢家典籍浩如煙海，若無師承，則異族學生摸索終生，有時還是足未入戶。今日有些所謂漢學家，難免是如此。可是我對本書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對她沒有盡到一位論文導師所應盡的責任。我反而是在批閱她的論文時向她學習。原因是當她開始撰寫時，我正自哥大轉業在紐約市立大學，而且轉過來擔任的且是一項綜合多種學科的行政工作，我把

哥大中文圖書館的鑰匙交還原主之後，對圖書資料的掌握便沒有以前隨時出入那樣方便了。

本書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讀的是私立紐約大學，我轉業任教的是紐約市立大學，兩校皆無漢籍收藏。研究漢學師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館。我既離哥大，則各校研究生來尋求「指導」者，我都以資料檢閱不便而謝絕。在這種情況下，傅君作了我的研究生也就變成了例外。因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婦早有通家之好，平時論學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學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為進修學位，選師適及下走，我雖自知不學，於情於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見大著問世，我附驥為文，真不勝其慚汗也。

傅虹霖博士是東北的媳婦。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氏，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亞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漢學界。屬東北世族，與原東北軍將領和老少帥本家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本書由祖夫人來寫真是得心應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華和博士學位的科班訓練，我想這部傑作，也是夠傳世了吧。我是精讀過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論公允，文筆流暢，頗得我心，中文譯作我雖尚未寓目，錦上添花自可預卜。不過博士論文畢竟是篇學術著作，自與通俗讀物各異其趣。我想有心讀者自能得其三昧；然書非自譯，偶難達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讀者為對象。譯漢以後，以中國文、談中國事、請中國讀者讀之，自更能有分外親切之感，如今發行在即，謹遵作者之囑，勿草蕪篇為序，尚乞海內賢明不吝教之，為幸。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於北美洲

西安事變新視野(代序之二)

吳天威

近來年，國內外學術界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的「西安事變」的研究頗有進展。尤其是一九八六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時，海內外各地紛紛舉行紀念討論會。同時，海峽兩岸當局亦做有限度的開禁檔案，提供給學者研究，遂有大量原始資料發表；目睹或親自參與「事變」而尚健在之人士多肯撰寫專著或宏文記述其事。新資料及新著述之問世，足使過去所作「事變」史實報導之錯誤得以糾正和我們對「事變」之觀念有所改變。因此，對「西安事變」之研究不僅有所突破，亦開闢了新的方向，這是值得我們鼓舞和慶幸的。

政府檔案文件當然是寶貴的原始資料，遲早會公諸於世，僅就此類資料仍無法獲得諸如「西安事變」之重要事件之全貌。幸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總攬地方軍政大權有年，舊屬尚健在者猶多，他們因愛護張、楊兩將軍，和對祖國的忠誠，並願為歷史作見證，再者時過境遷，個人恩怨已不復存在，故能道出官方文件及其他原始資料未能記載或遺漏的史實，亦可暢抒己見，提供對「事變」有見地的解釋。

今楊將軍已作古，張將軍雖健在，似不便寫自傳或作專論澄清「西安事變」中之錯誤、複雜事實和疑問。此蓋為我國之傳統習慣，大人物不寫自傳；故有賴於張、楊兩將軍之舊屬和故交來彌補此一缺欠。因他們同張、楊兩將軍朝夕與共，或參贊機密，或只側面旁觀，但均可從不同角度上提供有關

「西安事變」之資料，及衡量張、楊兩將軍之生平。不宜因所知僅點滴而不予發表；我們必須集少成多，則有助於西安事變資料之充實，其貢獻於國史亦可觀。

西方學者研究「西安事變」亦頗值得我們注意。加拿大之陳志讓從心理學觀點的「自尊欲」分析蔣介石被困西安時之心理及其對策。美國范力沛就國際關係及南京政府內部之派系結構分析南京方面所形成西安之對策。兩者研究顯然皆有突破性，足資今後研究「西安事變」之借鑒。

傅虹霖博士十餘年來，足跡遍美國、台灣、中國大陸，為收集張學良將軍資料，不遺餘力，她所收集張學良將軍之資料，尤以西安事變所收資料之豐富為我研究該段歷史者之冠。今傅博士對張將軍整個政治生活歷史予以徹底之研究，其成果不僅有助於對「九一八」及「西安」兩事變之了解。按張將軍繼乃父執政東北以來，對我國內政與外交實舉足輕重，其影響之巨，尚未能由專攻我國近代史者作全部的、科學的闡述與檢討。因此傅博士巨著尚屬創舉，其書付梓頗具意義。傅著敘述張將軍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領導方面軍之始，至輾轉去台灣息影幽居，無不盡其詳。不僅治史謹嚴，而文筆流暢，實為不可多得之作品，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貢獻。今以付梓在即，筆者不揣冒昧，特為作序，共慶其成。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於美國